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故宫博物院文物西语翻译策略研究

许俊, 李美琪*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 长春 130117

DOI:10.61369/SE.2026070036

摘 要 : 文物翻译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桥梁, 其质量直接影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国际交流的深度。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 聚焦故宫博物院文物名称的西班牙语翻译实践。通过对大量译例的系统梳理, 本文归纳出文物西语翻译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层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 旨在从“信、达、雅”的基础上达成文化意象的精准传递与交际意图的圆满实现, 从而服务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

关 键 词 : 生态翻译学; 文物翻译; 故宫博物院; 西班牙语翻译; 三维转换

Research on Span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Cultural Relics of the Palace Museum from an Ecological Translation Perspective

Xu Jun, Li Meiqi*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 : Cultural relic translation is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the exter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s quality directly affects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the depth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his paper takes ecological translation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focuses on the Spanish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the names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Palace Museum.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 large number of translation exampl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Spanish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nd accordingly proposes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iming to achieve the precis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imagery and the complete realization of communicative intention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faithfulness, clarity, and elegance", thereby serv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go-global" strategy.

Keywords : ecological translation theory; cultural relic translation; Palace Museum; Spanish Translation;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博物馆是展示人类文明和历史记忆的重要场所, 也是传承文化、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重要机构。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不断推进, “文化外扬”的过程中怎样准确而富有诗意地把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哲理智慧的文物展现给西方世界, 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紧迫感和学术价值的综合性问题。

文物翻译同科技或者商务翻译相比, 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怎样才能正确地把握住文物的名字以及它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意义。刘庆元(2005年)认为, 在文物翻译时, “忠实”和“流畅”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 他认为在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应该把“流畅”放在第一位, 因为译文是否清晰可读是保证文化信息能够被有效传达的前提条件。这一说法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 并逐渐形成一套博物馆对外宣传翻译实践中的基本准则, 即以目标语言受众为中心、突出信息的呈现、文化的内含等(王颖, 2012; 王瑞雪, 2016)。

近几年来, 学术界对于文物翻译这一问题已经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 试图对它的繁杂之处加以认识并找出其中的难题。传播学理论运用目的在于突出翻译过程中信息传递的效果以及它给受众带来的影响(方佳、唐金凤, 2022; 刘雨萱, 2024), 合作原则的加入是为了对翻译活动中语用合理性的深入分析(鲍学莉、李娜, 2022)。相比之下, 模因论(杨幼丽, 2014)主要研究的是文化信息怎样在翻译过程中被复制并广泛流传。在多种理论体系当中, 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所提出的生态翻译学具有较强的理论吻合度和操作意义。根据“适应/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 本文主要从译者在翻译生态系统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入手, 对通过语言、文化、交际这三个方面形成的三维转换机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一、博物馆文物翻译的原则与生态翻译学的契合

学术界一般认为,文物翻译属于外宣翻译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促使人们在交流中达成有效的、持久的理解(王颖,2012;林文涛,2013)。文物翻译中更加本质的难题就是怎样处理好源语言文化背景中的“文化特有元素”的缺失问题。对于该问题而言,学术界普遍接受并且遵照执行的三大基本准则,也就是目标语言读者导向原则、信息突出原则和文化意义突出原则(刘庆元,2005;王瑞雪,2016)。

生态翻译学所提出“三维”转换理论同博物馆翻译实践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及语用需求存在很强的一致性、相容性。在语言转换的时候,译文应该依照目标语言的文化表达习惯来保证它的顺畅和清晰,不能因为句式的杂乱或者词汇的选择失误而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为了达成文化深层次交融以及精确传递的目的,在开展翻译工作的时候需要探究并且精通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保证文化象征意义被正确地传达出来,避免出现由于文化误解或者缺失而导致的问题,这才是“文化内涵彰显”战略得以落实的重要途径。该种视角不单是关于受众中心策略的制定,而是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相关联(王瑞雪、王颖,2016年)。

二、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文物西语翻译的策略类别分析

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讲,翻译就是译者根据具体的翻译环境和生态条件做出的选择性活动(胡庚申,2011)。文物的“翻译生态环境”是十分复杂且全面的系统,它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一种语言的范畴,它牵涉到源语和目标语文化背景下的历史沿革、审美准则、宗教观念和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的差别。在此情况下,译者是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原作进行分析,然后形成译文,从而实现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跨越,并且还要将文化的意义加以转化并传播出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译者应该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这三大方面做适应性的转换工作,即保证翻译出来的作品既能够正确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又能够很好地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特点和交际需要。

结合故宫博物院文物的西语翻译实践,笔者将文物名称中所蕴含的信息归纳为以下四个类别,并分别探讨其在“三维”转换框架下的翻译策略:材料特性、器物形态、装饰图案、制作技术和有文化内涵的各种信息。

(一) 材质信息的翻译策略

文物名称中所用到的材质标识,比如金、银、铜、铁、玉、瓷、陶、漆、木、石等等,一般都属于客观事实性的数据范畴,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对应的词汇大多十分准确并且一致。此类信息的翻译环境比较单一,文化冲突少,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准确的词义对等转换,保证信息完整无误地传达到目标语言里。

就文物材质而言,在西班牙语里一般会有对应的专门术语,用直接翻译的方式可以准确传达出信息。此类翻译从语言上来说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由于词汇具有普遍性,在文化以及

交际方面也不会造成误解。

例1:金瓯永固杯 → Copa de oro de la estabilidad eterna

该文物名称中的材质标识“金”在翻译成西班牙语的时候直接用“oro”代替,并且把它放在了介词短语“de oro”里边,这是西语里常见的用法,即用“材质修饰+中心词”的形式来表达物品特点。准确传达材质信息是创建后续文化意象“瓯永固”理解架构的重要根基,它给剖析它的内涵及象征意义赋予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支撑。

例2:紫檀木嵌黄杨木雕云龙纹宝座 → Trono de sándalo rojo con incrustaciones de boj y motivos de dragón entre nubes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两种不同的木材种类。紫檀木应该翻译成“sándalo rojo”,也就是红檀香木;黄杨木对应的是“boj”,是直接翻译过来的。译文用“de...con incrustaciones de...”这样的结构来表现主体材料和嵌入材料之间层次的关系,使语言维度上准确、逻辑连贯。

(二) 器型信息的翻译策略

文物名称中的器型标识(鼎、尊、瓶、壶、罐、碗、盘、杯、如意、屏风等等)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些特定的词汇既标明了文物基本的形状,又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由于不同的文化体系里器物形式和功能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联系,所以这类信息的翻译难度很大。许多带有中国特色的陶瓷器形,在西班牙语文化环境中找不到准确的对应物,这就成了翻译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处理这类信息的时候,译者要在忠实原意和保证信息易懂之间做出慎重的选择。

当中国的器物在西方文化里有形态或者功能相类似的物品的时候,应该选择可以表现出它的功能等价性的词汇来翻译。该方法从语言层面来说明显改善了文本的可读性,并且在交际方面很好地调动了读者的认知记忆,进而达到信息的有效传达与理解的目的。

例3:青铜鼎 → Caldero de bronce / Trípode de bronce

鼎是中国古代社会里最明显、最重要的礼器之一,它不但是烹饪用具,而且是祭祀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件,具有很强的文化和宗教意义。在西班牙语里,“caldero”这个词既包含着容器和炊具的基本用途,又体现出它作为一个储存和加热设备所具有的主要特点,“trípode”更多地表现出了它的三足形体构造,这种构造不但给它带来了稳定的支撑作用,而且成为辨别这类物体的一个重要标志。两种翻译方法各有侧重,译者应该根据具体的文物特性来决定使用哪种翻译方式。强调其作为礼器的特性翻译成英文就是Ding(ceremonial caldero)。

对于有中国特色并且在目标语言文化里没有直接对应的器型,应该用音译的方式来保留它的文化特性以及独特的身份,并且加上简单的注释来说明它的功能特点或者外形上的特点。此策略从文化上很好地保持了原语文本的文化特点,在交际方面又借助加注释的方式较好地弥补了信息缺失的情况,保证了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完整性。

例4:如意 → Ruyi (cetro de buen augurio)

在西班牙语里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实物来表达“如意”,如果

用“cetro”来翻译，则会失去它的文化内涵以及独特的意义。用音译“Ruyi”加注释“吉祥寓意的权杖状器物”，既保持了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专有名词的独特之处，又给读者指明了认识它所具有的象征含义的途径。

例5：簋 → Gui (recipiente de bronce para ofrendas de grano)

簋是商周时期普遍使用的一种青铜礼器，主要用来装黍、稷等粮食做祭祀用的供品。将“Gui”音译成“recipiente de bronce para ofrendas de grano”，既很好地保持了它的独特性，又清楚地表明了它所起的作用是盛放谷物祭品的容器，并且把它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深深地融入其中。

（三）纹饰与工艺信息的翻译策略

文物名称中的装饰图案（云龙纹、缠枝莲纹、饕餮纹、夔纹、凤纹、八宝纹等），制作工艺（雕刻、刻画、镂空、镶嵌、金箔贴饰、掐丝、珐琅彩绘、釉里红等）都是体现它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底蕴的重要因素。这类信息翻译不是简单的词汇对译，而要保证文化象征意义准确无误地传达出来并被理解。在西语文化背景之下，很多纹饰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要么没有存在过，要么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解释，这成了文化差异中最明显、最繁杂的一种难题。

就纹饰图案来说，如果它的形象带有比较明显的跨文化直观可感性特点的话，那么就可以采用描述性的直接翻译方法，即用简洁的西班牙语准确地描述出这个纹饰的视觉外观以及主要特点。此法从语言上坚持译文清晰易懂，但在文化方面会致使一些象征意义的丢失，不过它仍然能保证视觉信息被有效传达并被理解。

例6：缠枝莲纹 → Motivos de loto entrelazado / Flores de loto con tallos enroscados

以莲花为基本元素，用不断重复的枝蔓来表现其生命力旺盛、和谐共生的特点，是传统艺术里的一种装饰纹样。译文中的“loto entrelazado”或者“flores de loto con tallos enroscados”，准确地把图案的视觉特点体现出来，并没有直接点明它所包含的“连绵不绝、生生不息”的吉祥寓意，但是基本的信息已经得到了展现。

例7：饕餮纹 → Motivo de Taotie (máscara zoomorfa, símbolo de poder y misterio)

饕餮纹是商代、周朝青铜器上出现最多、最突出的一种兽面纹饰，它的名称直接来源于古代神话里的贪食怪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简单地将其译成“monstruo glotón”就显得过于简单化了，并且在准确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偏差，没有体现出原名里包含的文化特点以及复杂的含义。将其译为“motivo de Taotie”，并加上“máscara zoomorfa，象征着权力和神秘”的注释，目的是既要保持这个文化符号的独特性，又要让西班牙语读者清楚地知道它的深层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也就是一个兽形面具，代表的是权力和神秘两种象征。

（四）文化专有项与综合信息的翻译策略

文物名称里常常包含很多的文化专属元素，比如某个朝代的纪年、有名的名人或者地名，此类信息在源语言文化语境中具有

明确的指涉意义和丰富文化内涵，在目标语言文化里却是完全陌生的，是翻译生态体系中最复杂、最难处理的部分之一。面对信息高度密集的文物名称，译者需要根据翻译目的和受众期待，对各类信息进行筛选与重组。通常的做法是：保留主要的识别元素，即器物种类、材质等，精简地叙述，对于文化特有词汇用音译或者意译加注释的方式来处理，保证信息准确无误、文化内涵得以体现。

例8：乾隆款胭脂红蓝地轧道洋彩折枝花卉纹合欢瓶 → Jarrones gemelos con motivos de flores esmaltadas

在本例中译者没有对具体的时期（乾隆年间）、颜色（胭脂红或者蓝色底色）、工艺（轧道洋彩工艺）做详细的描述，只是把重点放在了“双联瓶”（jarrones gemelos）和“珐琅彩花卉纹”（motivos de flores esmaltadas）这两个主要方面上，从而形成一个翻译版本。此决定从语言层面来说是想使译文精练流畅，在实际上也考虑到了观众能否快速抓住文物的主要视觉特征，进而达成交流的效果。虽然在追求博物馆普及性展览效果的时候，难免会舍弃很多有文化内涵的细节，但是从推广知识和文化广泛传播的角度来讲，这是必要的、合理的。

例9：紫禁城 → Ciudad Prohibida

该译名用的是意义直译的方法，“紫禁城”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紫微宫、人间帝王禁地的文化内涵，用“Prohibida”来表示，很好地抓住了它的本质特点，是文化象征在西方语言里实现良好适应的一个典范。

三、生态翻译学对文物翻译实践的启示

基于上述对不同类别信息的策略分析，生态翻译学为提升文物翻译质量提供了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强化译者的中心地位与综合素养。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中心”，这要求文物翻译工作者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能力。这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的素养提升：第一种是语言能力，即对于中文有很深的理解，并且能够很好地掌握西班牙语；第二种是文化洞察力，需要对中国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全面的认识，并且还要了解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社交习惯和认知方式，从而准确地把握不同文化之间微妙的差别，并且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知识去应对各种情况。第三种是翻译理论基础，即在一定的翻译目的和环境条件下，根据不同的翻译标准来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使译文达到最好的效果。

第二，我们要对文物翻译领域展开深入的研究，并推进其规范化和系统化的进程，从而创建起一套完备且准确的翻译准则和方法论体系。目前在文物翻译上还存在译名不一致、文化内涵处理不当等问题。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应该吸取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对它所指导下的文物信息翻译工作做全面系统的整理和分析。

第三，深化“三维”转换在实践中的分层应用。译者应将“三维”转换作为一种自觉的翻译策略体系。在处理事实性信息时，应以语言维的准确对应为首要目标；在处理文化意象时，应

以文化维的准确阐释为核心任务，灵活采用音译加注等补偿策略；在处理综合信息时，应以交际维的整体效果为最终旨归，敢于进行信息筛选与重组，确保译文在目标语环境中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

四、结语

文物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关键一环，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的重要途径。成功的文物译名

是译者在语言、文化、交际三维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主动适应、审慎选择的结果。面对纷繁复杂的文物信息，译者需要根据信息类别的不同，灵活运用直译、意译、音译加注、增译、减译等不同策略，实现文化意象的精准传递与交际意图的圆满达成。未来，随着数字技术和新媒体平台的发展，文物翻译的“生态环境”将更加多元，这对翻译工作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继续深化生态翻译学在文物翻译领域的应用研究，不断探索和创新，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全球传播贡献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

[1] 鲍学莉, 李娜. 论合作原则指导下的文物翻译——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品翻译为例 [J]. 现代商贸工业, 2022, 43(3): 33-35.

[2] 方佳, 唐金凤. 传播学视角下三星堆博物馆网站文物翻译策略研究 [J]. 新楚文化, 2022, (3): 62-65.

[3]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 [J]. 中国翻译, 2011, 32(02): 5-9+95.

[4] 林文涛. 文物翻译的规范化探析 [J]. 四川文物, 2013(04): 86-89.

[5] 刘庆元. 文物翻译的“达”与“信” [J]. 中国科技翻译, 2005, 18(02): 41-43+5.

[6] 刘雨萱. 翻译传播过程视角下的文物文本翻译探究 [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4, (12): 119-123.

[7] 王瑞雪.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文物翻译研究 [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6(12): 83-84.

[8] 王瑞雪, 王颖. 基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文物翻译研究 [J]. 中国教育学刊, 2016, (S1): 84-86.

[9] 王颖. 文物翻译与文化传播 [J]. 学理论, 2012(30): 127-128.

[10] 杨幼丽. 模因论视角下的博物馆文物翻译研究：以宁波地区博物馆内的文物翻译为例 [D]. 宁波大学, 2014.